

□ 陈躬林

有效需求不足的体制障碍分析

内容提要: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有着更深层次的体制方面的原因,尤其是微观企业体制方面的缺陷,而不只是通常所说的膨胀与衰退相交替的短期波动。因此,不能只是刺激需求,只限于总量调控,而忽视了微观企业制度的改造,不能急于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了支撑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体制构造。

关键词:需求不足 经济体制 消费 投资

作者简介:1943年生,男,福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有效需求不足成了时下经济学界关切的主题,但许多文章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扩大需求的对策上,而忽视了需求不足深层次原因的分析。

一、消费需求不足的体制障碍

当前我国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国内贸易部对消费品市场调查:1996年我国供过于求和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93.6%;1997年下半年这一比例扩大到98.4%;而1998年上半年则达到100%。与此同时,社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其中机械加工和家电行业设备闲置率高达40%—50%。

问题是社会经济在运行过程中为什么会出出现不正常的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呢?对此,凯恩斯的《通论》(1936年)作出了开创性的分析,但凯恩斯只分析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它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制度是稳定的,它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为分析背景的。因而在他的宏观经济学里不再涉及经济制度问题。但我国目前正处于巨大的社会经济制度变革过程中,制度因素通常是我国经济活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对我国经济活动分析是不可以把制度因素舍去的(张曙光,1997年)。

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但我认为主要是现阶段的体制障碍。第一个原因是现阶段国民的现期收入增长趋缓以及国民对预期收入增长前景看淡,而这又是与我国现阶段企业制度改革还没有走出困境相联系的。国民的消费支出不仅取决于现期收入的增长,还与国民对今后收入增长的预期有直接的联系。如果现期收入增长较快,预期收入看好,国民的消费倾向将会提高;反之,消费支出就会受到影响。

近几年我国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呈递减趋势,以GDP表示的增长率1996年为9.7%,1997年为8.8%,1998年为7.8%。国有企业亏损面扩大,破产增多,导致下岗失业人数不断扩大,减少了城市家庭收入。乡镇企业发展低迷,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村乱收费、乱摊派屡禁不止,使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1998年上半年为零增长。国民收入增速减缓,不仅限制国民的现期收入增长,也对预期收入增长产生消极影响。中国人民银行近几年对城乡储蓄户的问卷调查资料表明,反映居民收入预期状况的收入信心指数是呈下降趋势的。这些都直接影响了现阶段消费需求的增长。

问题是无论是现期收入增长缓慢,还是预期收入看淡,其背后的主要原因都是体制障碍,尤其是企业制度问题。改革以来国民经济主体部分的国有企业改革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其亏损面与亏损额呈加大的趋势,产权不清,政企不分,仍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因而在国内民营企业与国外企业的竞争中,缺乏活力的国有企业的生存空间更加狭小了。这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而且造成了人们对未来收入增长的消极预期。与此同时,我国的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仍然受到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障碍,尽管党中央已经明确把非公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但人们对私有财产的预期还不稳定,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非公有经济受到的歧视还很严重,这使非公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以及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都取决于企业的活力,而企业活力又是由企业制度决定的,当一个国家还没有建立起产权明晰的有竞争力的企业制度,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就会受到影响。

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近几年的边际消费倾向超常规的下降,而边际消费倾向迅速下降的深层次原因仍然是体制问题。边际消费倾向通常是下降的,也就是说随着收入增加,消费支出也会增加,但消费支出增加的速度要低于收入的增加速度,这就是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但近几年我国消费倾向递减速度似乎过快了,统计资料表明,我国边际消费倾向1995年为0.845,1996年为0.733,1997年则降为0.576。这就是说1995年增加的1000元收入中消费支出为845元(储蓄为155元),那么1997年同样增加的1000元收入中消费支出则只有576元了,储蓄则上升到424元。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边际消费倾向在这一时期内大幅度下降呢?我认为近几年加大了对原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而新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又没有很快建立起来。在传统的计划体制里,国家为居民(主要是城市居民)提供了就业、住房福利、义务教育、公费医疗等保障,居民几乎没有为生活中风险而储蓄的意识。现在不同了,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风险已经成了现实,福利分房制度已被取消,原有公费医疗制度也在瓦解。据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发布“1997年对中国消费者态度和生活方式趋势的报告”,我国居民储蓄目的排序:一是支持子女教育,二是为医疗做准备,三是改善住房,四是购买耐用消费品,五是防老。我国近几年边际消费倾向过快下降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有直接的联系。

导致边际消费倾向低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费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很低,因此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越大,边际消费倾向则越低。资料表明,近几年以基尼系数所反映的我国收入差距有较快扩大的趋势,1989年为0.382,1995年则上升到0.445。基尼系数上升有正常的一面,这就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传统的大锅饭分配制度被打破了,市场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在加强。但也有不正常的一面,这主要是因为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不规范的市场交易而产生的大量灰色、黑色收入以及城市与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尤其是近几年国有企业在产权虚置的条件下扩大了经营决策权,由于经理的行为缺少所有者的约束,又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使政府难以实施有效监督,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一些权力者利用体制漏洞,大肆侵吞国家财产,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

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的第三个原因是市场体制不完善而导致的交易费用过高,从而阻碍了

市场交易,也限制了消费需求。市场无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种权力机构直接进入市场,中央已经开始整顿市场秩序,如要求公检法部门与军队退出经济活动。但我国市场秩序仍然很混乱,行政性垄断严重存在,部门封锁与地方割据破坏了正常的市场交易,假冒伪劣活动猖獗与地方利益有着很大的联系。缺少规范的市场导致很高交易费用,因为交易中的权益经常得不到保障,保障权益的费用很高(如需要打官司),高交易费用必然限制市场的正常交易。在我国消费水平进入更高阶段的时候(如住房、汽车等),市场的交易秩序显得更为重要了。例如消费信贷,当银行向居民提供消费信贷的时候,不仅要居民的资信有充分了解,而且还需要一套相当低成本的交易规则来保障合同的实现,否则,交易成本很高,银行就不敢放开进行消费信贷了。又如商品房买卖中的一些欺诈行为,包括房屋的质量、房产权的合同、面积的计量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购房的积极性。

二、投资需求不足的体制障碍

长期以来投资规模膨胀是我国社会经济中一大弊病,但现在我们却要面对投资需求的不足。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现阶段投资需求的不足呢?我认为,体制因素仍然是主要的。导致投资需求不足的第一个原因是很长时间里的低层次的重复建设、盲目建设而造成的供给过剩,而低层次的重复建设的根源又是由于传统经济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革。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投资体制并没有实质性的改革,只是把更多的投资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而决策者仍然不承担投资的风险,投资预算软化的传统弊端也没有得到根本性改革,这种体制由于地方政府追求短期政绩(表现为更高增长速度)以及国有企业负责人追求短期利益使低层次重复建设行为变得更为严重。但这种重复建设在一个时期没有表现为供给过剩,这是因为我国传统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需求过度、供给不足,经济学家通常称之为“短缺经济”。改革开放以后,巨大的社会需求为供给迅速增长提供了剩余空间。但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低层次重复建设开始表现为供给过剩,从而限制了投资需求。据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提供的资料,我国许多工业品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产品严重的积压。这加大了投资的风险,也限制了投资需求。既然现有生产能力闲置,供给过剩,产品积压,怎么还会有更多投资需求呢?资料表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新增额占国内生产总值年新增额的比重由1993年的62.08%下降到1997年的25.3%,名义投资年均增长率由1992—1996年的33.7%,下降到1997年的10.1%。

导致投资需求不足的第二个原因是国有企业由于体制障碍而导致效益低的问题。由于产权不清,所有者缺位,难以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导致国有企业效益低下,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由于所有者缺位,重复建设屡禁不绝,投资决策失误更是频频出现。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原地区某制药厂,投资30亿元,建成之日就是关门之时。又据《羊城晚报》报道,广州乙烯工程投资80亿元,试产仅3个月就停产。所有者缺位导致对于经营者监督的缺位,在经济决策权进一步下放以后,使经营者挥霍侵吞国有财产行为难以约束,出现了老百姓所说的“穷庙富方丈”的特有现象。由于所有者缺位,经营者可能与职工联手侵占国有资产,一些企业虚报利润,不摊折旧,以套取更高的工资增长,使工资增长率大大超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例如1995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10.49%,而同期人均工资增长率为27.6%。经济学家称之为工资侵袭利润,其实连老本(折旧费)也吃了。90年代初,国有企业盈亏相抵还略有剩余,但近几年来随着亏损的扩大,出现了国有企业债务负担过重和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过多的并存局面。当国有企业不可能再随意从国有银行获得资金的时候,国有企业不仅欠缴税款和利

息,甚至购买原材料与支付工资都难以进行,更谈不到扩大对固定资产的投资了。

导致投资需求不足的第三个原因是现阶段的投资体制与企业体制问题。在上面分析中,我们指出,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社会需求不足、生产能力闲置、供给过剩的事实,但这并不是说,我国经济活动中已经不存在着投资机会,更不是说我国经济中可供投资的资金短缺因而限制了投资,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实际上,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着诸多的投资机会:一是与供给过剩并存的是有效供给不足,以钢材市场为例,我国有1700家钢厂、3000多家轧钢厂,每年有2000万吨小型材生产能力闲置,但与此同时每年都要大量进口板材与管材,这是低层次重复建设造成的无效供给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局面。二是即使是全面的供给过剩,如果有更高质量的产品,仍然存在着投资机会。以方便面为例,1990年初,大陆的方便面市场已经饱和,但就在这时候,新加坡的营多面、台湾省的康师傅却在大陆市场上登陆,凭借着更高的质量与更先进的工艺,他们很快地就抢占了大块的市场。因此,投资机会关键在于企业(或者说企业家)的创新能力,而企业的效率又是由企业制度决定的。我们的国有企业缺少发现市场机会和敢于承担风险的内在动力。三是更重要的,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陈旧、设备老化,而造成产品质量低、消耗大、竞争力不强。新技术革命正在使我国传统产业的技术设备变成沉淀成本。我国实际上处于一个巨大的技术更新时期,这为投资需求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空间。

我国经济活动中不仅存在着巨大的投资机会,而且我国居民的高储蓄倾向也为投资需求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准备。我国居民储蓄在利率降低以及收入增幅下降的情况下,仍然大规模增加,目前已接近6万亿元大关。居民在国有银行的储蓄是要支付利息的,如果银行不能把这些资金贷放给企业,银行则面临巨大的债务风险。那么国有银行这笔巨大的储蓄资金为什么不能更多地转化为企业的投资需求呢?我认为主要是现阶段投资体制与企业体制问题。我国现有投资的主体是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由于私营企业还难以从国有银行获得信贷资金,这样国有资金的供给主要是国有企业。但一个时期以来国有企业低层次的重复建设以及资金使用中的低效益不仅使国有企业无力归还银行借款的本金,甚至连利息也无力支付。一些国有企业采取低估资产、剥离资产、无视银行债权等方式“逃债”,使银行呆帐、坏帐迅速增加,导致了国有银行的债务危机。这种风险以及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相继出台了一些行政的与法律的约束手段,要求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承担资金营运的责任,结果出现了信贷低迷等“惜贷”现象。由于体制的原因,当政府要求国有企业与银行承担信贷风险的时候,他们缺少敢于承担风险的投资动力(由于缺乏剩余收益的激励)。这就是通常所说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这与私营企业不同,在规范的市场经济里风险与剩余收益是对等的,他们要承担投资的风险,但也会获得相应的剩余收入,正是这种承担风险责任,迫使他们作出谨慎的投资决策,也正是这种收入激励,使他们勇于承担风险,发现市场投资机会。但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都缺少这种机制,一旦要求他们承担风险,他们也就不愿意寻找投资机会了。

三、总量调控的局限性

上述分析表明,现阶段社会需求不足并不仅仅是通常的短周期波动,它有着更深刻的体制原因,所以不能就需求谈需求,不能仅仅根据凯恩斯经济学进行需求总量方法的调控。当体制缺陷成为社会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原因时,宏观调控就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

有效需求不足情况下的宏观经济政策是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刺激社会总需求的。在

这次调控中,政府首先注意了货币政策,中央银行从1997年开始取消了信贷额度的控制,更为积极的货币政策是从1996年开始连续7次降低存贷利率,降幅之大,次数之多,都是空前的,但在一个很长时间内,降息并未产生有效的作用,各项宏观经济指标没有好转,反而呈持续下降之势,只是到1998年下半年,中央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指标才开始有所回升,但仍然很不理想。

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降低利率不仅可以促进消费需求(尤其是信贷消费),也可以扩大社会投资需求(因为筹资成本降低了)。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利率下调未能停止经济衰退呢”(陈东琪,1998年)?我们认为主要是上述所分析的体制障碍:例如由于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居民为生活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如疾病、失业)以及重大支出(如上学、住房)而准备的储蓄,可能不会因为利率下降而作为现期的消费支出。又如利率下降对私人投资可能刺激不大,因为民营企业难以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而其他直接融资渠道还没有开通。而国有企业大都负债累累也难以从银行再获得资金。从而使利率下降对社会投资需求的刺激作用也不是很大的。

有效需求不足时的财政政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财政收入政策即减税政策,减税的意图是刺激消费支出(个人所得税减少,使税后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有可能增加消费支出,但我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数比例极低,因而这项政策不会有什么作用)与投资支出(公司所得税减少,使公司税后利润增加,有可能增加投资支出)。但目前减税是难以实行的,因为短期内降低税率会造成财政收入的减少,在我国财政收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这是无法承受的。实际上,我国企业税负并不是很重,但政府的各项收费过多,据计算1995年我国税收为6083亿元,占GDP的10.4%,而政府的收费高达8706亿元,占GDP14.9%。因而减费可以刺激企业的发展。但减少收费仍然取决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由于国有企业产权关系模糊,政企不分,使企业无法抵制上级政府的各类摊派和收费。同时,由于政府机构臃肿,冗员过多,也使政府的许多乱收费问题屡禁不止。

二是财政支出政策。这是更为重要的财政政策,目前我国政府所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增加公共工程支出。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政府加大财政支出力度,1998年7月份财政部将公路投资计划由年初的1200亿元增加到1800亿元,同时大幅度地增加水利和环保等基础设施的财政性资金支出。在给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的基础上又增发1000亿元用于公共投资的建设性国债,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99年政府将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财政支出政策也是有限的,一是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很低,能够用于建设性投资支出则更少了,因而它对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投资需求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二是以举债形式增加公共投资支出也是有限度的。首先,它直接受财政收入的制约,政府的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最终要由财政收入来支付;其次,大量举债可能出现“挤出效应”,即以减少民间的投资与消费支出为代价;最后存在着赤字财政引发的通货膨胀的危险。

上述分析说明对于现阶段我国经济活动中的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仅仅通过需求总量调控政策是不够的。由于存在着体制缺陷,因此这些总量调节政策往往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例如在国有企业产权模糊的情况下,如果放松银根,扩大货币供应,很可能又导致新一轮的低层次的重复建设。只有加大改革力度,使企业有内在的约束与激励的机制,才会从根本上提高投资的效率。

既然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需求不足有着更深刻的制度障碍,那么我国经济 (下转第25页)

如果有 50% 的家庭投资 50 万元的债转股,则投资额可高达 3.5 万亿元。应该说,贷款消费对他们只是精明的理财选择,而并非超前消费。这部分消费者或多或少已参与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并且是事业上的成功者,因此目标是为他们设计丰富的投资途径,以吸引已参与投资的消费者更多资金投入和尚未参与投资的消费者投资需求,从而为解脱企业困境、提供就业机会、提高从业者收入、扩大消费需求,充分发挥这部分剩余购买力的潜能。

可见,上述对策的共同点是由政府和银行承担预期收入风险,以使居民对国民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从而激发生活消费和投资消费需求。

参考文献:

1. 薛莉:《我国金融运行总体平稳》,《上海证券报》1999 年 8 月 13 日。
2.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199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统计》1999 年第 3 期。
3. 钟禾:《启动当前经济的着力点应放在居民消费上》,《中国统计》1999 年第 7 期。
4. 国家统计局科学研究所小康课题组:《中国小康进程》,《中国统计》1998 年第 10 期。
5. 陈淮:《中等收入者——增发特种国债与消费信贷的组合政策,高收入者——对购买特定消费品的收入减免所得税》,《中国经济导报》1999 年 5 月 28 日。
6. 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用信用卡拓宽消费信贷》,《中国经济导报》1999 年 7 月 9 日。
7. 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居民更愿储蓄》,《经济日报》1999 年 7 月 30 日。
8. 常兴华:《合理的差距要拉开,不合理的差距要缩小》,《中国经济导报》1999 年 5 月 7 日。
9.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现阶段启动消费的困难与消费政策》,《经济与管理研究》1999 年第 3 期。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金融系、上海财经大学统计学系;邮编 200433)

~~~~~

(上接第 19 页)增长速度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将会受到限制。由此,我们的政策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不能仅仅把政策放在刺激需求总量上,应该重视构建支撑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制度基础;二是不能仅仅追求短期的增长速度,那样可能出现新一轮的重复建设或新一轮的泡沫经济,而应该从长期着眼,继续推进体制的改革,重构微观(企业)的制度基础,为我国经济长期有效增长创造基础。重要的是继续解放思想,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制度创新,实施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的战略性改组,确立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大力推进市场交易规则的建设。

---

#### 参考文献:

1. 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格局》,《经济研究》1998 年第 10 期。
2. 陈东琪:《对近两年宏观经济政策操作的思考》,《经济研究》1998 年第 12 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大调整:一个共同的主题和必然的选择》,《经济研究》1998 年第 9 期。
4.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寻求多重经济目标下的有效政策组合》,《经济研究》1998 年第 4 期。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管理学院;邮编:350002)